

風雨八十年

秦天真

著

貴州人民出版社

风雨八十年

秦天真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虹

封面设计:石俊生

风雨八十年

秦天真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阳经纬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1.875 印张 210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 册

ISBN7-221-04895-9/K·466

定价:36.00 元

自序

八十有余,岁月悠悠,往事萦怀。

革命人生的途程,或漫长,或短暂;或顺畅,或曲折,每个人都会留下绝非孤旅的足迹。然而,历史从来不属于任何个人。出于这种理念,就记忆所及,写下了这部回忆录。

少年时代家境清贫、社会黑暗,在心灵深处触发了愤世不公,向往平等的火花;青年时代的抗日怒潮、求知欲望,激起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大义、革命真理的探寻和光明社会的追求。风烟滚滚中,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宿愿,踏上革命的征途,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生。

无论是在艰苦复杂的白区秘密工作时期,还是在延安学习和工作的岁月;东征、南下、西进的戎马征途;在迎来人民革命胜利而投入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日日夜夜,哪怕是在众所

周知的“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屈的日子里，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共产党员的忠诚，始终是我的行为准则。

风风雨雨，毫耄已至。长久地留在我心中的是数十年所做的有限却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工作；我所尊敬的学校师长给予的孜孜教诲；对牺牲在敌人屠刀之下和战争硝烟中的战友的追思缅怀；对共事多年的同志和至诚相交的党外朋友的深厚情谊；对蒙冤虽洗而却已早逝的同志和亲人的痛惜与眷念。

几年前，在宁静的花溪，用了十多天时间回忆并口述了这漫长的历程，无限的情怀。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热心地作了完整的录音，事后又按录音逐句记录下来，成 850 余页原稿。置案已久，许多老同志每每催促我及早整理成书。毕竟年岁不饶人，只好请来曾在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助我删繁就简，作了文字上的编整，加点标题，疏理成稿。

向贵州省委领导同志书陈拟送出版的想法，蒙爱支持，深表谢忱！

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同志和朋友，有些健在，有些作古了，虽未一一提及，但他们的革命业绩和贡献，是历史的真实，人们会永远铭记。

革命，没有平坦的路，恰又是为了开拓一条属于人民的康庄大道。

这部回忆录，不过是伟大革命历史洪流中点点滴滴的真实再现。我希望这能有助于它的读者，从一个侧面更多的了

解过去。

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正不断谱写着惊世的历史长卷。回眸既往,憧憬未来,人们当可理解人生的真谛。

脱稿付梓,书怀为序。

秦天真

一九九七年七月于贵阳

目 录

1 自序

1 1909~1930 革命生涯的前奏

1 向往平等平权

6 省城求学 开始接受革命思想

13 1931~1933 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一心找红军找党

13 抗日反蒋的民族救亡运动

30 回乡从教 聚集革命力量

37 1934 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党支部领导下的活动

37 加入中国共产党 毕节支部的诞生

39 草原艺术研究社及其活动

43 党支部领导下的武装力量

46 毕节形势骤变 党支部应急转移

54 开辟安顺 立足贵阳

65 1935~1936 中央决定建立贵州省工委 任务繁重 形

势严峻

- 65 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
- 68 护送中央代表 完成绝密任务
- 75 加强组织建设 开展军事工作
- 79 “七·一九”事件的发生及其历史教训
- 91 隐蔽转移 坚持斗争
- 105 1936~1937 西安事变转新机 抗战伊始赴延安
- 105 黔桂边境搞军运 香港找到上级党
- 119 抗战开始 奔赴延安
- 131 1938~1939 贵州局势喜忧并存 延安受命返黔
- 131 抗日统一战线下的贵州局势
- 137 从延安受命返黔
- 139 营救被捕同志
- 145 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
- 159 贵州民先的建立和“八·一三”事件
- 166 1940~1944 奉调再赴延安 整风审干运动
- 166 再赴延安
- 171 整风和审干
- 180 1945~1949 欢庆抗战胜利 东进南下西进
- 180 学习“七大”精神 欢庆抗战胜利
- 183 东进齐鲁

197	南下豫皖
219	从皖入浙 西进赣湘
226	进军贵州
232	1950~1957 接管和建设贵阳市 调管铁路建设工作
232	解放前夕的贵阳
234	接管贵阳市建立人民政权
239	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禁毒禁娼,安定社会秩序
248	恢复国民经济 进行城市建设
253	市政工程造价与建设
259	统一战线工作
268	铁路建设
271	1958~1964 创建贵州工学院
271	创业维艰
287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工作方针
302	1965 推行半工(农)半读教育制度
302	全面部署 示范推广
305	边远民族地区民办学校及其影响
308	1966~1976 “文化大革命”中灾难丛生
308	山雨欲来风满楼
310	从隔离审查到枷铐入狱
318	再次得到历史清楚的结论

-
- 320 复出工作后风波又起
- 328 峰回路转 事机瞬变
- 333 三星陨落
- 337 粉碎“四人帮”
- 339 1977~1985 拨乱反正 团结奋进
- 339 只争朝夕
- 340 落实贵州地下党和游击队政策
- 346 两件解放之初错杀冤案的昭雪
- 349 倡议恢复威宁草海
- 355 贵州党史工作
- 366 结束语

1909 ~ 1930

革命生涯的前奏

向往平等平权

贫困的生境 时代的感触 贵州西北部的毕节地区,与川、滇两省接壤,人们常用“一步踏三省”来描述这里的边陲特征。过去,东面几个县相对较富裕一些,而西面的几个县则很贫穷,有所谓“黔西大方一枝花,毕节威宁苦荞粃”的概括。1909年,我出生在毕节县这块贫瘠土地上的一个贫困家庭。

早先,毕节县城的秦家,虽远非名门望族,但也算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祖父和祖母同年早逝,父亲成了我家这一支系的单传,家境便日趋困窘。开始记事的时候,父亲是一

个帮工学徒，打得一手好算盘，但他并没有逃脱失业的命运，全家的生计全赖母亲做针线活路和推磨豆腐，也租用过祠堂的公地种菜来卖，挣几文钱维持。有些富裕人家看不起我们这个连一口铁锅也无力购置的穷家，更不要说那些目中无人的豪门大户了。童蒙时的我，已朦胧地感觉到人世间贫富悬殊的不公，心里暗暗愤愤不平。记得一个灾荒之年，跟着年长的人去打地方上的“义仓”，也就是开仓济贫，我虽年幼无济于事，却领略到贫困死亡线上群力抗争的胜利喜悦。

或许是父母寄希望于我将来能够改变这样的家境，忍饥挨饿也要拼命挤出一点钱送去读书，望我走上仕途。所以，六岁时就到私塾读书，也在家帮助母亲种菜和磨豆腐，挑着小菜和豆腐到街上去卖，一天进出一两次，闲时三次，颇为为家里挣了些过日子的零钱。上街卖菜，总要同顾主打交道，富家的人买菜东挑西拣，把菜挑子里的鲜菜弄得一团糟，还心狠压价，稍不如意就出口伤人。心里积压着怒火的我，时常顶撞他们。毕节城里珠市街有家裁缝店里的一个人，遇到我同那些刁滑的买主争吵时，常为我说话，打抱不平。世间毕竟也还有公道的人，心里得到一点安慰。

父亲在清末参加过地方上的哥老会，俗称“袍哥”、“公口”。这一般是以城镇失业手工业工人和农村中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主体的结社组织，借以在经济上互助自救，在政治上自

我保护,每个加入其中的人都要履行一套似乎很严格的手续,并以义气为重,相互提携关照,不得违规。这种组织有时也常被地方恶势力利用。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讲到如何处理这些“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时说过:“这是中国的困难问题之一,这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辛亥革命前后,与孙中山先生有联系的贵州自治学社,就曾经十分重视并运用了贵州各地哥老会的力量。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虽然对这种帮会活动并不很热心,但却有为人仗义的品格。有一次他看到一个饥饿已极不得已而路窃行人者被抓住吊打时,他挺身出面允诺出钱担保放人,失主向他索要保金,他分文没有,答应后补,不了了之。失业已久的他,终于通过帮会里的人介绍,谋得一个为商家包揽过秤进出货物的活路,秤一百斤货得几文铜钱。父亲把他所得的微薄收入多用去喝酒,或资助别人,于家用并无大的补助。在很长的时间里,也因为他喝酒耗费,同母亲常常发生争吵。我曾怨他没有给过我父子之间的温暖,又不体贴母亲的艰辛。后来,我谅解了他的身世和处境,人不得志,借酒消愁,也就不再记恨于他了。

家庭经济如此拮据,一文钱也来之不易,我深有感受。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仍主要靠着母亲和自己的劳动收入,维持了继续读书的可能,也总是以优良的学业回报母亲和自己。在

私塾一年多,读得很认真,也有收益,但很不满足于刻板、枯燥的背诵吟哦,于是转入到小学从头开始接受新学的教育。

老师的启蒙 时事的震动 辛亥革命前后,贵州军阀之间的争战此起彼伏,一直延续到 20 年代末。地处边远的毕节也不免祸乱的波及,同时也打破了往日的闭塞。使我至今难以忘记的是小学时代的老师萧云章,第一个真正的启蒙老师。他完全摒弃了旧学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给我们讲历史和地理,也讲应该怎样做人的道理,循循善诱。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发生世界大战,袁世凯屈从日本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听到十月革命,俄国的沙皇被推翻和苏维埃的建立,听到列宁这个名字和无产阶级等前所未闻的名词。那时我虽然并不理解,但却明白了在毕节以外的地方,还有更为广阔的世界天地,到处都存在穷人和富人的不平等,俄国革命开创了消灭这种不平等的道路。萧云章老师很器重我,他还出钱给我订了两年的《少年杂志》,拓开我的眼界,增长知识。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举国响应。一天晚上,毕节县城的群众街头集会,萧云章老师登台演讲,我提着一盏马灯,站在他的身旁为他照亮,听他慷慨激昂地痛斥北洋军阀政府,呼唤民众奋起斗争。我深深地被他的爱国热忱和犀利的演讲所感动。这以后不久,他离开学校,不知去向了。这很可能是迫于回避反动当局的追查而出走。我久久地思念着他。校长龚定

久体罚学生,教师周云阁领导我们反对龚定久,事成而周也离开学校。小学毕业以后很想到省城贵阳升学,而家里无力承受最起码的经济负担。恰好周云阁先生离校后在县城自办了一个讲习班,我得免费进去求学。讲习班仅开两门课程,一是国文,二是数学。记得当时他给我们讲授康有为的《大同书》,“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觉得很有道理,真了不起。我曾无意中看到一本《论说文范》,里面有一篇文章批判康有为等人发动的维新变法,说“何来神圣?敢充华神”,意指康有为并非圣贤,竟敢冒充中华救世主。我视这种批判为无稽之谈,认为敢于求大同、争取大同的人就是我心目中神圣的人。愤慨之余,在那篇文章上涂了几笔痛骂作者的话,就把它扔掉了。

毕节县城有几户人家的子弟曾在黄浦军校读书从戎,缪向初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信奉孙中山的主张,也拥护中国共产党,在毕节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其弟缪正元常把他家订阅的《新青年》杂志拿给我看,另外还有商家李仲文的弟弟李代忠也不知道从哪里弄到几期给我看过,由此知道李大钊、陈独秀这些人,觉得他们很有学问,不满时政,敢讲别人不敢讲的真话,写的文章很新鲜也很有道理,发人深思。还有胡适、钱玄同这些创导“新文化”运动,提倡写白话文的人,我也很敬仰。

十五岁以前在毕节县这个边城生活和读书,接触了各种

各样的思想,也开始有了一些直觉的辨识,凡是讲平等,讲平权,讲改变穷苦命运的道理和主张,我都乐于接受,也引发了对于平等、平权的最初追求和向往。

省城求学 开始接受革命思想

身无分文的“富家子弟”怀着读书的渴望和萌发的理想追求,1925年我和同学粟多祥、刘瑞生商约,准备一起到省城贵阳投考中学。他们两家的经济条件都较好,可资助我。行前,粟多祥不知有什么事要先走一步,约定在响水镇上的刘小舟家等我和刘瑞生。两三天后,我带着仅有的五个地方铜币,同刘瑞生一起启程,到梨树坪吃了一顿饭,刘瑞生开了饭钱,不知什么原因他改变主意,不想去贵阳,两人就分手了。我独自走到离毕节县城不过三四十公里的响水镇上,来到我称为二哥的刘小舟家里,他不问我的来意,或许粟多祥已经先向他讲了我们要去贵阳读书的事。他留我住了一夜,叫他的老婆拿块包布捆裹几件换洗衣裳递给了我。次日离开他家,过了县境,所带的那几个铜币就不再通用了,送给了一个铜匠。一路上省吃俭用,我也无力支付,都是粟多祥开支。到了贵阳,

在府后街一家叫顺祥旅馆的小客店投宿。粟多祥向店家说：“请招待一下秦先生，他家是毕节大财主，又是独儿子。”这话本来是世俗的妄语，而那时候从外县到省城来的人怕露财被抢劫，常扮成穷相。毕节是盛产大烟之地，有大烟就有大洋，难怪店家信以为真。我被蒙上富家子弟的幻影，权且得到一个栖身之处。客店的主人姓徐，老板娘经管生意，我们都称呼她徐太。过了些时日，店家也不向我催交拖欠的食宿费用，对我的款待也算热情周到，这更使我忐忑不安。我向徐太说，我是个真正的穷学生。越是坦诚说明，她越把我当成大富阔少，确实厚待。我隐藏着穷困而竟被误为阔少的内心痛苦。穷不能立足，富则可欺世，不由得更加感到世态的炎凉。

军阀混战 学无宁日 赶上中学招生，我考取了省立第一中学，为学费的事正发愁，粟多祥约了刘端绪，带着在军官学校当教官的彭希富来到顺祥旅店。大家都是毕节的同乡，闲谈之间，刘端绪向彭希富借五块钱。彭问借钱何用，刘端绪指着我说：“天真考取了中学，没有钱缴学费。”彭希富没说二话，掏出八元递给我说：“交了学费剩下的拿去当零用吧。”这样，我进入了贵阳第一中学的初中部读书。

1926年6月，周西成继冯汉章而任贵州省省长，独裁专政。他上任的第二个月，广东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他竭力反对共产党，对国民党和北伐也都不感兴趣。1927年他